

三国不是“魏蜀吴”

人们通常认为三国只有魏、蜀、吴三个政权,或者称为曹魏、蜀汉和孙吴,其实这些都不对。220年曹丕篡汉称帝,定都洛阳,国号确实是“魏”,史称曹魏,标志着三国历史阶段的开启。221年刘备称帝,定都成都,国号却不是“蜀”,而是“汉”。229年孙权称帝,定都建业,国号“吴”。所以真正的三国应该是魏、汉、吴。魏、蜀、吴的称呼多因《三国志》所起,《三国志》由《魏书》《蜀书》《吴书》构成,给人以错觉,认为刘备建立的政权是“蜀”。

其实,刘备称帝时在祭天文告里说得很明确,他建立的朝廷是刘汉王朝的延续,国号仍然是“汉”,所以刘备当皇帝不称登基而称继位。对其他两方来说,在当时也不存在一个“蜀国”:曹魏认为自己是合法政权,自然不承认“蜀国”的存在,提到时多称其为“贼”;孙吴与蜀汉结盟,双方举行过正式盟誓,互相承认,提到蜀汉时通常称其为“汉国”。

《三国志》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,之所以不承认“汉国”,是因为晋朝由曹魏禅让而来,而曹魏又由东汉禅让而来,所以晋朝立国的前提是汉朝已经于曹魏政权建立时结束,对于刘备“承汉祚”的说法自然不予认可。南门太守

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背后

1945年8月6日,日本广岛遭遇美国原子弹轰炸。围绕日本缘何非遭遇美国核打击不可的问题,一个几乎见诸所有历史教科书的耳熟能详的说法是,因日本拒不接受《波茨坦宣言》,所以美国决定对其实施核打击,苏联也宣战出兵(中国东北)。对美国而言,此乃所谓“尽早终结战争,避免造成更多流血的日本本土战的最佳策略”。但这种说法,实际上未必站得住脚。

原子弹“志在必掷”

原子弹从一开始就是作为“志在必掷”的实用武器研制的。要知道,美国原子弹研发制造源自纳粹德国核武研发的刺激,带有极强的危机感。罗斯福死后,杜鲁门继任总统,他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:“何时、在哪儿使用炸弹(指原子弹)的最终决定权在我,这一点不容错位。我一向把原子弹看作是一种兵器,理应付诸使用,对此从无任何疑念。跟随总统左

右的最高军事顾问们曾劝诱我使用之。我与丘吉尔会谈时,他也曾毫不犹豫地对我说过‘如果有利于终结战争的话,赞成动用原子弹’的话。”可见,既然是兵器,使用没商量一是美国战争政策最高决策者的意志。

日本一直是首要目标

至少从1943年5月开始,日本就已经被设定为核打击的首要目标,且越往后越具体化。1944年9月,罗斯福与丘吉尔之间已然达成了要对日本动用原子弹的约定。

原来,美国的战略目标,是赶在苏联对日参战之前,迫使日本投降,以争取对日占领的主导权,遏制苏联。德国投降后,苏联单方面撕毁《雅尔塔协定》,闪电“收割”,把此前遭纳粹铁蹄蹂躏的东欧诸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。美绝不容忍东欧的“悲剧”在冷战“桥头堡”日本重演。日本投降一旦延迟,那么德国投降三个月内,

苏联进攻日本的承诺期限就将到来,美国将在对日占领问题上陷入被动。因此,此时的课题,已不是日本投降与否的问题,而是何时投降的问题。

争取外交主动

美国历史学者加尔·阿尔佩罗维茨在其著作《原子弹外交》一书中,论证了美国如何以原子弹为砝码,在对苏外交中争取主动的过程。杜鲁门继任总统是在1945年4月12日,他面对的最大课题是如何终结战争,并在战后格局中争取主导权,而最吃紧的问题就是应对波茨坦会议。由于彼时,原子弹研发已到了核试验的最终攻坚阶段,杜鲁门尽量想把会议日程向后推迟,以期能拿到踏实的“原子弹牌”。

波茨坦会议上美英两国首脑在第一时间分享了“孩子诞生”(指核试验成功)的情报,但通报斯大林则是在一周以后。斯大林并未显得很吃惊,若无其事地说了句:“是嘛……那么就可以在日本使用了。”

暗中却加紧了从“满洲国”进攻日本的进程,同时下令莫斯科的原子弹研发工作提速。

对日种族歧视

对日本人的种族歧视是一个深层原因,虽然很少表面化,但却是一个颇为现实的因素。日本军队在战时的残虐暴行,强化了西方对东洋社会所抱有的“日本人性恶论”的既有成见。当然,歧视从来是双向的:有日人针对白人的“鬼畜英美”式的妖魔化,便有美国人对日人所谓“猴子”的侮辱性蔑称。既然是诸如“兽类”“猴子”等非我族类动用“新式武器”歼灭之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了。

回过头来看,日本挨了两颗原子弹的惩罚,正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:落后就要挨打。但惟其如此,日本对其“被爆”的悲剧,也基本上抱着现实主义的应对:接受“宿命”安排,绝少听到对此的高调控诉。

刘柠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

厚道齐鲁地 美德山东人

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中的山东人

山东省文明办 大众报业集团

“反对浪费 崇尚节约”公益广告



节约粮食 积福

青岛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